

访问伊朗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瑟尔

闫 鑫

访问纳瑟尔实属偶然，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刚到美国天主教大学文化与价值研究中心没有几天，来中心参加研讨会的印度尼西亚教授阿卜杜（Abdul）告诉我要去乔治·华盛顿大学拜访著名学者纳瑟尔（*Hossein Nasr*），这次拜访是由中心主任麦克林教授（George F. Mclean）帮助预约的，机会难得。这个时候，孤陋寡闻的我对纳瑟尔几乎处于未知状态，但拜访我尚不熟悉的大学者对于我而言吸引力极大，阿卜杜为我找来了一本书，《赛义德·侯赛因·纳瑟尔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eyyed Hossein Nasr*），这本书属于“在世哲学家图书馆系列丛书第28辑”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这个丛书系列从1939年《杜威的哲学》算起到2009的《罗蒂的哲学》已经出版了32辑，从他的自传读起，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纳瑟尔1933年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个以学术和医学而显赫的家庭，祖上出了不少大学者，祖父和父亲曾任宫廷御医，他的祖母的家庭同样显赫，出了很多诗人和艺术家，自小从祖母她们学习了一些诗和民歌。他的家庭有着伊斯兰教神秘主义一派的苏菲教（Sufism）的传统，这些都成为了他的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根源。他的父亲虽然曾是著名医生，宫廷御医，但对哲学、文学和教育更感兴趣，并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还懂法语，以及一些拉丁语和英语，曾经写过《知识与伦理》这本书，并曾任德黑兰大学教授，系主任等职位，还出任过伊朗教育部的秘书长以及代理部长等政府职位，是当时的社会名流。他的家庭因此常常高朋满座，名士云集，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培养了他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并接触到了西方思想和宗教，以及其他文化传统。这培养了他牢固的传统波斯文化基础，和积极的普遍主义意识和开放的胸怀。他早在十多岁就感受到了哲学与宗教，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张力，当然，他认为，自己一直有着牢固的宗教信仰。还有一点，他有一位叔叔萨义德·阿里·纳瑟尔（*Seyyed Ali Nasr*）曾经出任过民国初期的驻华大使，因此得以从中国带回一些艺术品放在他家里，他的父亲也常常鼓励他要尊重东方文化。

纳瑟尔1945年离开伊朗，离开了孕育他的土壤，前往美国纽约，后来在新泽西的佩迪中学（*Peddie School*）继续他的学业，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作为穆斯林，他每逢礼拜天和别的同学一样参加教会活动，这为他后来长期与基督教对话埋下了一个伏笔。在校期间，他学习了法语，并积累了英语、西方文化、美国历史、基督教、科学等知识，不过这是他一生中脱离本土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教最长的一段时间。由于数学出色，四年半后，他进入了麻省理工物理系。他喜欢理论物理，并选修了大量数学课，此外，还选修了一些哲学课，阅读了许多西方经典哲学家的著作，对印度哲学越来越感兴趣，印度教（*Hinduism*）成为了他思想中的重要养分，麻省理工的丰富资源使他接触到了印度、伊斯兰、中国、柏拉图和中世纪欧洲的思想传统。在此期间，他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和永恒哲学，解决了困扰他的精神危机，提升了他的内在生命，也成为了他一生坚持的哲学导向。也是在麻省读本科期间，他的精神世界历经了印度、柏拉图、欧洲中世纪思想，中国的老子和庄子后，最终找回到了自己的民族和家族传统，伊斯兰教和苏菲派，这是个转折阶段，他认为，

他能够回归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离不开所受到的现代西方以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外的其他主要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不仅在麻省理工获得了物理学与数学学士学位，也在历经了精神之旅后开始回归到伊斯兰教和苏菲派。不过，那时候的他不能决定是否继续学习物理之外的其他一门科学还是转到科学和哲学史，因此他选择在哈佛大学修读地质学与地理学硕士，他的博士期间的专业是科学技术史。在此期间，他选了科学史的课，并准备写伊斯兰的科学这样的博士论文。在科学史系，他随科恩（I. Bernard Cohen）学习了科学史，伊斯兰哲学和神学，以及伊斯兰文明史，并继续学习了现代哲学和黑格尔。在哲学系还学习了欧洲现代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他还曾经在哈佛大学政府学院做过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助手，不过，他说他并不喜欢政治思想，但他和基辛格围绕东西方的思想和文化问题进行过多次辩论。在哈佛期间，他还接触了日本佛教，主要是禅宗思想。当然，对天主教思想也保持着兴趣。从在麻省理工以及哈佛所受的教育看，他可谓是勤奋好学，胸襟宽阔，博学多识，受教并结识了众多名师。

1958年哈佛大学毕业，他结束了在西方将近13年的教育，返回伊朗，以副教授身份任教于德黑兰大学，同年评上了教授。在婚姻生活上，放弃了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西式婚姻，接受了由家庭安排的门当户对的东方式婚姻，这和胡适先生颇有相似之处。从进入德黑兰大学到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他一直在德黑兰大学当教授，并且30岁就评上全职教授（full professor），随后担任系主任，期间推行了哲学教学改革，强化伊斯兰哲学在学科中的基础地位，对欧洲哲学为中心的情形做了一次颠覆。当然，他也扩大了西方哲学的教学范围，引进了英美哲学，以及印度哲学。他强调学哲学应该从伊斯兰哲学的传统出发看待其他的传统，而非从西方的视角出发看他们的民族哲学传统。纳瑟尔很不满意西方哲学一统天下的状况，试图复兴民族哲学，这一思想值得中国国内哲学界思考，国内依然习惯抬高西方哲学，尤其是以欧陆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的地位则不够高，这从前一段时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讨论可见一斑。另外，现在还有人怀疑传统中国哲学的价值，为此，纳瑟尔也曾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提到过，但认为新儒家和道家在复兴。这一判断可能基于西方以及港台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状况。他推行的哲学教学改革，也就是强调伊斯兰哲学的基础地位，在伊朗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的这一做法，对于中国、日本、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的哲学教学应具有借鉴作用。也就是，要从本民族的哲学出发，以本民族的哲学为基础进行哲学教学与科研。

在哈佛期间，他想像约瑟夫·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样，完成一部伊斯兰科学的研究著作，不过，他认为，李约瑟的著作奠基于一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上，他要从伊斯兰传统对哲学和科学的理解的基础上完成他的著作。但由于伊朗革命爆发后他流亡国外，因此只完成了三卷本的《伊斯兰科学书目诠释》（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Islamic Science）。

在伊朗期间，他一直著书立说，并在伊斯兰世界，欧美等多个国家进行演讲，参加学术会议，并勤于著述，还从日本学者那里继续学习很多东方哲学，包括佛教的禅宗等知识。在伊朗期间，他享有盛誉，虽然致力于哲学、学术活动以及教育事业，但政治需要他的参与，需要他平衡政权和宗教之间的力量，他也就卷入了政治，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流亡在外，但他认为，心灵之家一旦找到，是不会因为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心无居处，事实上，他一直从事着伊斯兰宗教和哲学的研究工作，

不管是身在伊朗，还是在美国。

纳瑟尔再次到美国的身份有所不同，也经历了一些波折。1979年犹他大学给他提供了份荣誉访问教授的工作，一年后他接受了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宗教系教授的聘用。在刚到美国一两年，还处于动荡不定时，他只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写成了十个章节的《知识与神圣》（Knowledge and the Sacred）这部书，一周一章，他认为这部书是上天的恩赐，写作时宛如行云流水一般顺畅，所谓神来之笔，在他看来，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其影响超出了伊斯兰学术圈。1981年他参加了在爱丁堡大学为期三周的具有上百年历史的享誉盛名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演讲者包括为我们中国思想家熟悉的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汤恩比、普特南、查尔斯·泰勒、保罗·蒂里希、怀特海等哲学家、宗教学家，据讲，该演讲一年只请一位思想家，参与这样的演讲，对于学者来说，是一种荣誉，而纳瑟尔是第一位伊斯兰学者，也是第一位受邀参加演讲的东方学者，演讲之后，他的书也做好了出版准备。

1984年，他接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担任伊斯兰研究的带头人，并一直工作至今，此外，还担任传统研究基金会的主席。他一直积极从事伊斯兰哲学和比较哲学，宗教与比较宗教，以及文明对话等活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向杜维明先生提议开展儒家与伊斯兰的对话，在哈佛大学开启了小范围文明对话会议，1995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了更大规模的文明对话。他们都不同意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都强调不同文明之间要进行对话。当然，对话的基础都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

纳瑟尔除了致力于伊斯兰科学、宗教、哲学、艺术等学习和研究之外，积极思考并参与伊斯兰与西方的对话自然是重要的活动之一，身处美国以及强势的西方文明主导之下的时代，思考本民族的宗教和哲学，复兴传统，与西方对话，这些都是他从事的重要工作。作为哲学家，他还思考环境，人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普遍问题，求知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追求，当然，他的根是伊斯兰文明、传统形而上学，永恒哲学。教学、写作、思考之外，他还喜欢音乐和诗歌。

对纳瑟尔教授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我和阿卜杜在一个下午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拜访他，他的办公室坐落在（Melvin Gelmen）图书馆里，前往他的办公室的走廊两边摆放着珍贵的手稿。他的秘书接待了我们，在他的秘书的墙壁上，我惊奇地发现了红色的“吉祥如意”中国剪纸，尽管这所大学里有很多中国学生，在秘书和助手之间的墙壁旁放着一个书架，里面还有一个小书库。等了一会，他走出来，精神矍铄，和蔼热情，握手后把我们迎进了应该是套间的里屋里，里屋的两个墙壁的书架上同样摆满了书，一面是窗户，还有一面挂着一些民族饰品，桌子上可以发现他的一些手稿。

他的著作很多已经被翻译到了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世界，他在伊斯兰学界享有盛誉，阿卜杜曾经很早就读过他的书，并说前任印尼总统还曾翻译过他的书。纳瑟尔强调伊斯兰的学问要靠自己，不能靠西方学者，不能走西方的研究的路子。尽管他在美国接受了中学直至博士的教育，但他的写作却一直是以伊斯兰为主线，所以，他的这种主张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然，他的书中有大量的西方资料，在强势的西方话语下，西方时避不开的。谈到中国时，他提到了儒学复兴等问题，他对中国的最新学术走向这么关注，让我觉得十分有趣，当然，作为从中国哲学学科背

景走出来的学生，我对此并不十分乐观，但也确实应该承认，“国学”是有复兴的迹象。不管“国学”复兴是真相还是假相，但中国应该有更多的像纳瑟尔这样坚持本民族传统的思想家，这应该是中国思想家的立足之本，尤其是当中国学者面对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时，总要有自己的根基，才有参与对话的前提条件。这正如杜维明先生常常提到的，对话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差异是对话的前提，而差异就在于自己的特色，否则就只能变成别人的注脚，可以忽略不计。在我逛过的几家书店里我发现，有关中国学说的著作，不管是宗教还是哲学，还是很稀少，即便有，也多是翻译过来的几本《论语》、《老子》，而译者或者是作者，也主要是西方学者，我就有这种感觉，中国文化走出来，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道路还很长，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下更大的功夫。这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学者愿意立足民族学说的研究，有中国的角度，并以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印度等文明，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为世界贡献我们自身的智慧。应该说，西方学说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研究的对象，但不应该成为一种主导和基调，这也是国内学界有些人反思的“以西解中”、“汉化胡说”等问题。破除欧洲中心主义，还是要靠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可以拿出来供西方人看，和西方展开对话，为人类做出贡献。

他还提到了和杜维明教授在哈佛的文明对话，并很热情地为我找来有关中国哲学和伊斯兰关系的研究著作，作者由他的学生，原籍国日本，现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伊斯兰教、儒释道的学者 Sachiko Murata 的《伊斯兰之道：伊斯兰思想中的性别关系资料书》（*The Tao of Islam: a sourcebook on gender relationship in Islamic thought*）；《苏菲之光的中国闪点》（*Chinese Gleams of Sufi Light*），这本书由杜维明先生作序；《刘智的圣学：儒家术语下的伊斯兰思想》（*The Sage Learning of Liuzhi: Islamic thought in Confucian terms*），这本书的作者共三人，Sachiko Murata, William C. Chittick, 以及杜维明先生，纳瑟尔为本书作了序。他们的来自中国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同在美国，但关心的是自己文化的问题，这样的学术和思想共享和切磋，体现了学者以求知为目的，分享智慧，寻找真理为底色。当然，他们的合作体现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通过类似的学术交流活动，更好地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增进友谊，这也有利于破除偏见，促进世界文明的和谐。

他还提到有儿批中国学者曾经拜访过他，想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我注意到国内有人在做他的思想的研究。并说他即将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北京论坛”这一级别最高的学术盛会。作为伊斯兰世界的学术领袖和当代知名哲学家，我想，思路清晰，思维敏捷的他会和国内一流的学者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通过这样的国际学术交流，对于增加彼此的了解，分享智慧，对学人来说，这是十分有益的事情。

当我们快要离开时，我也要求他送给我一本有关伊斯兰哲学的书，起因是这个领域几乎不懂，我只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这些学科，当时就想看看能不能从第一流的伊斯兰哲学家的著作里学到一些未知的东西，他欣然答应，起身帮我找了一本他的新著《伊斯兰哲学：从起源到现在》（*Islamic Philosophy from its origin to the present: philosophy in the land of prophecy*），提笔用英文写上“送给年轻的中国哲学家，闫鑫”，并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一流思想家的如此签名，实属对我这个还徘徊在哲学门槛，不知如何进入哲学和思想殿堂，视野

狭隘的年轻后生的极大鼓励。

访问结束后，我向乐黛云先生汇报了这件事，乐先生鼓励我写一篇小文章，随后我和麦克林教授谈起了此事，他很感兴趣，向我讲起了纳瑟尔的吉福德讲座，并引导我阅读纳瑟尔时应该注意的地方，其中包括对纳瑟尔影响深远的永恒哲学的重要任务肖恩（Frithjof Schuon），通过麦克林教授的指点，我们发现在《萨义德·侯赛因·纳瑟尔的哲学》一书中，他提到肖恩的次数，几乎和他提到“科学”的次数一样多，肖恩是纳瑟尔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期对他的思想转变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哲学家，并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从肖恩那里，他找到了永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书中还有刘述先先生对纳瑟尔有关“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批评以及纳瑟尔的回应，纳瑟尔属于传统形而上学家，致力于永恒哲学，强调传统与源头，关心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主动迎击西方中心主义，对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现代性等颇有微词，刘述先先生则持有不同观点，强调现代性与进步的意义。麦克林教授作为天主教背景的主要哲学家也对纳瑟尔教授有关“时间与永恒性”问题进行了反思批评，纳瑟尔进行了相应的回应。麦克林教授向我讲解起纳瑟尔的哲学思想时，要我明白的还有，纳瑟尔强调了文明源头的决定性作用，人类历史似乎是在按照已经指明的道路前行，人，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纳瑟尔的思想颇有神秘主义色彩，理解起来不易，他和中国先秦时期的老庄有类似之处。他对文明的批评，对于理性主义，科技主义的批判都有老庄的影子，对哲学后来发展到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越来越细的趋势也进行了批评，这和庄子书中“道术将为天下裂”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从中国的思想背景出发理解纳瑟尔，老庄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纳瑟尔本人早年在麻省时也读过老庄，他的著作中时常会出现老庄的话语。当然，思想家有各自的特色，思想不能够化约。纳瑟尔本人的苏菲传统，印度哲学，佛教哲学，道家哲学等都应是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我才疏学浅，在理解纳瑟尔，尤其是其哲学思想时，难免会有偏差之处，但从对他的访问和了解中，有觉得有几点是值得学习的地方，首先，他的一生致力于求知，学习、写作、演讲是他最主要的特色，他至今已经出版了50多部著作，500多篇文章，无疑是位高产的思想家。他虽然接受了美式教育，但一直致力于伊斯兰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他的著述也主要围绕着伊斯兰文明，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上坚持的是民族传统，对民族文化有一种强烈的担当意识。他的伊斯兰立场，也使得他有根基和基督教以至于儒家进行对话，我想，参加吉福德讲座离不开他对西方、中国、印度等传统哲学和宗教的学习和研究，更是因为他代表的是伊斯兰世界。国内正在进行的讨论的“国学”复兴问题，不应该是“问题”，更应该是一种自觉，是一种主动担当，立足传统，扬弃西方，这应该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参考资料：

Lewis Edwin Hahn, Randall E. Auxier, Lucian W. Stone, Jr. 编：The Philosophy of Seyyed Hossein Nasr（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丛书第28卷），芝加哥：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2001年。

Seyyed Hossein Nasr: Knowledge and the Sacred（The Gifford Lectures:1981），纽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年。

Seyyed Hossein Nasr: Islamic Philosophy from its Origin to the Present, 拉合尔:
Shirkat Printing Press, 2007 年。